

论 闻 一 多 爱 国 诗

陆 耀 东

在中国新诗史上,闻一多先生的地位虽然难以超越郭沫若同志,但就爱国诗而论,则郭难以超越闻。这里,我想专就闻先生的爱国诗(不包括如《园内》、《南海之神》这样有爱国因素并不以爱国为主题的诗),作一探讨。

一

现在春又来了,我的诗料又来了。我将趁此多做些爱国思乡的诗。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,价值甚高。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。^①

闻一多的爱国诗,有些写于留学美国期间,有的则写于“五卅”运动中。中国近代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。解放前,我国留学生在海外常受歧视和轻蔑。闻一多在美国时,也耳闻目睹亲历过。在这种境遇中,在热血青年的心里,自然会激起重重爱国浪涛。加之他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,从“五四”起,就将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;在个人品质上,他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美德,热爱祖国,热爱故乡,热爱亲人,爱情忠贞专一,矢志攀登艺术高峰;在创作思想上,他既不否定或轻视爱情诗,但又并不将爱情诗和爱国诗等量齐观。他深知,在祖国危难的年代,优秀的爱国诗尤其宝贵。他多次说过,自己之所以写下一首又一首爱国诗,是想用自己爱国激情的浪花,“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,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”^②;是为了“以励国人之奋兴”^③。闻一多,是自觉地写下这些爱国诗篇的。

在现代新诗爱国名篇中,闻先生的作品

数量较多。仅就严格意义上以爱国为主题的作品而言就有:《一个观念》、《发现》、《祈祷》、《一句话》、《洗衣歌》、《孤雁》、《太阳吟》、《忆菊》、《长城下之哀歌》、《我是中国人》、《爱国的心》、《醒呀》、《七子之歌》等。自然,作为文艺作品,数量并非决定性的因素。一百首平庸之作,不及一首好诗;粗制滥造的所谓“多产作家”,很快就会被历史的河水冲刷掉。闻先生的爱国诗,不仅数量较同时代诗人多,而且在质上,也少有可与之并驾齐驱的。

闻先生的爱国诗,大致而言,主要有四个方面。

一是直抒爱国心情。《太阳吟》、《忆菊》、《一句话》、《爱国的心》,属于这一类型。《太阳吟》、《忆菊》是一代绝唱。《一句话》的构思和所取的角度很别致。开始用大量诗句写埋在心海深处的一句话说出后,可能激起的反响,以及长期缄默一旦说出时的分量:

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,
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。
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,
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?
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,
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

爆一声:

“咱们的中国!”

读者可以神会到诗人的心与祖国贴得很紧很紧,爱国之情的热度很高很高,但诗又无刻露之弊。《爱国的心》将抒情寓于完美意境之中:

我胸中有一幅旌旗,

没有风时自然摇摆，
我这幅抖颤的心脏，
上面有五样的色彩。

这心脏的海棠叶形，
是中华版图底缩本。
谁能偷得去伊的版图？
谁能偷得去我的心？

巧妙地将心比做祖国版图的缩本，“谁能偷去伊的版图？谁能偷得去我的心？”显示爱国心的坚贞，并含激愤之情。

第二类诗，主要是通过歌颂祖国悠久的历史表达爱国之情，《祈祷》、《我是中国人》比较典型。前者与后者中的四节诗近似，但前者诗意较浓，它在首尾有这样一节：

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，
启示我，如何把记忆抱紧；
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，
轻轻的告诉我，不要喧哗！

抒情的气味浓，又给人一种亲切感，易于使读者感情的琴弦震动。

第三类作品，是将爱国情与反帝意识融化在一起，予以表现。《洗衣歌》、《孤雁》、《醒呀》、《七子之歌》、《长城下之哀歌》都具有这一特色。《洗衣歌》唱出了生活的真理，将谁真正卑下、肮脏、罪恶，昭告人间。《孤雁》对太平洋彼岸帝国主义所谓“文明”的绝妙描绘，在同时代的诗作中，可说是仅有：

啊！那里是苍鹰底领土——
那鸷悍的霸王啊！
他的锐利的指爪，
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，
建筑起财力底窝巢。
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，
喝醉了弱者底鲜血，
吐出些罪恶底黑烟……。

诗人将认识化为富有诗意的形象，诗就具有内蕴的丰富性，入木三分的深刻透视力，感人的艺术魅力。《醒呀》、《七子之歌》、《长城下之哀歌》和《我是中国人》、《爱国的心》，是

“五卅”引起的创作冲动的产物，曾在当时起了现实作用，而且，和过去所有优美的诗篇一样，跨越了时空的限制，今天仍受到人民欢迎。

这一类爱国诗，时代烙印鲜明，反帝色彩较浓。《醒呀》虽有可商榷之处，但曾激励过许多人的爱国情。《七子之歌》选取当时被帝国主义侵占的七地，拟为祖国七子，向母亲“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”，倾诉被帝国主义蹂躏的儿女的痛苦，每一节的最后，都哀号着：

母亲！我要回来，母亲！

这首诗向读者发射出强烈的感情冲击波。《长城下之哀歌》愤激和绝望交织在一起。诗人深感国家面临存亡关头，又不知当时已有拯救危亡的伟大力量在，于是用绝望的激愤来向人们发出警告，甚至说：

这堕落的假中华，不是我的家！

爱极生恨，感情发展到了极致。内中包含着对卖国贼、洋奴的谴责，更多的是指斥帝国主义。

第四类，《发现》是代表。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满，通过失望的情绪来表现对祖国的爱。这诗应与《长城下之哀歌》等联系起来读，才容易了解其真义。从这些诗中，我们也可获知闻先生必将与反动势力完全对立的讯息。

就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论，闻先生的爱国诗，在当时确实是首屈一指的。

二

诗的真价值，在内的原素，不在外的原素。④

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……⑤

闻一多在写爱国诗时，是极重视对美的追求的。他的许多爱国诗未收入集内，是他觉得那些诗艺术上有他不满意之处而自行淘汰的。他说的“以美为艺术之核心”，并不科学，也未必能概括他的文艺思想，但这话表

明对诗美的重视，其中也有合理的内核。

是的，对诗人来说，正确的思想，美好的感情，高尚的情操，是他创作的生命、骨骼和灵魂。不过，这只是成为优秀诗人的主要条件之一，并不能保证谁有了这一条件就能成为诗人，更不能保证他们写的诗都是精美之作。大家知道，二十年代和闻先生一样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，在中国是成千上万，何况比闻先生思想境界更高的人，大有人在。因此，我们在研究闻先生的爱国诗时，决不可忽视它作为诗的特质，艺术上的独创与贡献。

闻先生在《〈冬夜〉评论》等文中指出，诗的真精神真价值，它的最重要的内的质素是情感和幻象。而对于诗人的感情则特别强调要“至性至情”。

诗贵情真。无真情的诗，如纸花，没有生命力。诗人有真情而无适当的艺术表现力，他的作品也可能使人感到失真。闻先生的爱国诗，艺术水平不尽一致，但都不失真情。《忆菊》抒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。重阳的前一天，这正是赏菊的最佳季节，身居异国的诗人，自然想到了菊花，想到了可爱的家乡，想到了美丽的祖国，于是，很自然地唱出了深情的赞歌：

秋风啊！习习的秋风啊！

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！

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！

诗人用真情的丝线，将读者引入诗境，使读者不仅感到真实，而且有一种亲密的感觉。《发现》表现的也是爱国情，但与《忆菊》相反，不是赞歌，而是哀怨和失望之声：

我来了，我喊一声，迸着血泪，

“这不是我的中华！不对，不对！”

因为这和《忆菊》的典型环境也不同，《发现》是写热爱祖国的诗人，将祖国想象得如花般美丽的诗人，踏上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祖国国土时的感受。这一类诗，典型环境与典型感情互为依托，共同着生命。

有些短小的抒情诗，并不描绘典型环境，

只是将一种感受或一种情感化为具体的意象或形象，借以抒发自己的爱憎。如《一个观念》，主旨是在表现对具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祖国的爱，诗一开始就陡然用七个不同的词句来形容描写对象，最后写道：

啊，横暴的威灵，你降伏了我，

你降伏了我！你绉缦的长虹——

五千多年的记忆，你不要动，

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……

你是那样的横蛮，那样美丽！

诗的前半，仿佛是雷电前的风和云，使读者心灵上有准备，因而当诗人感情的电闪雷鸣般表现出来时，读者能够并且乐意接受它。

在诗中，诗人无端的故作多情，只能起反作用；即使是七分真情，三分做作，也会使读者对那七分真情有怀疑。闻先生的诗，在善于表现真情上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
闻一多的爱国诗，情真而浓，且有几分痴意。《一个观念》和郭沫若的名篇《炉中煤》相近，呈露的不是一般的脉脉温情，而是火一般热，蜜一般的浓，发狂似的痴。这种感情，对于诗人的创作，就象是热电厂发电所需要的热能一样。

闻诗中的爱国情，既有郭沫若诗的雄浑，又有徐志摩诗的妩媚、浓艳，兼具其长，自成一家。

闻先生极重视幻象和想象，他在《〈冬夜〉评论》中，对俞平伯先生的《冬夜》，以及当时与俞氏诗风相近的作品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他说：“幻象在中国文学里素来似乎很薄弱。新文学——新诗里尤其缺乏这种质素，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”。认为俞平伯“若能摆脱词曲的记忆，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，然后大着胆引噪高歌，他一定能拈得更加开扩的艺术。”这里，我不准备征引中外历代文学理论家和诗人的有关论述，因为幻象和想象对诗创作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。幻象和想象，一方面不管它飞得多么高多么远，都是从地面腾空；另一方面，它毕竟又

不是和在地上行走一样。知识、生活和诗人的形象思维力，是幻象和想象赖以翱翔的翅膀，缺一不可。闻一多、郭沫若的爱国诗，之所以在艺术上胜于同时代诗人的作品，因素之一是它们的幻象和想象格外新颖、奇美。闻先生的《太阳吟》真是想象万千，幻象迭出。诗人从太阳想到祖国和家乡，想到如果太阳能将五年当一天跑完那该多好，那就可免得诗人长期留在异域，又想到：

太阳啊——神速的金鸟——太阳！

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，

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！

诗的感情是现实的，人人可以理解的，但那一个又一个幻象却并不是可以实现的，也不是别人的想象所能及的。这首诗，如同用想象的彩线织成的一幅幻象画锦。

自然，我们也应看到，闻先生的部分爱国诗，是以浓丽繁密具体生动的意象见长。《忆菊》、《一个观念》等就是如此。诗人在《忆菊》的前一部分，以五节三十一行，几乎写尽各种菊花的色彩、神态，后一部分从这想象开去，抒写情怀。自然界的菊花，诗人的心花，如花的祖国，三者迭合为一。《一个观念》将抽象的“五千多年的记忆”，点染成具体生动的意象，仿佛是一个极美丽又有点横蛮的姑娘。诗人并不细描，略加勾勒，新颖的意象就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除情感、幻象、想象等外，闻先生的爱国诗，格律也格外优美。绝大多数都可朗朗上口，有的甚至具有完整的音乐旋律。《一个观念》、《发现》、《孤雁》、《太阳吟》既有共同之处，又各有特色。前二首诗行整齐，但实际上诗句参差不齐，都是以感情的旋律决定外在的格律。《一个观念》节奏由急骤到徐缓，抒情意味逐渐加浓；《发现》大多数诗行中都包含着一个四字句，每一个四字句都在格律上起着调节和补充的作用。《孤雁》、《太阳吟》、《忆菊》更多自由体诗的特点。《一句话》、《洗衣歌》是典型的新格律诗。

闻先生的爱国诗，多有佳句。它使人过

目不忘。除了思想感情的作用外，格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优美的诗篇，是各种因素有机构成的生命体。我在这里，只不过略及一二而已。

三

我个人同《女神》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在：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，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；《女神》之作者爱中国，只因他是他的祖国，因为是他的祖国，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，他还是爱他。⑥

闻先生的爱国诗，特色突出，其中绝大多数特色是优点，但也有一些特色与局限性以至瑕疵相联系。

诗人时期的闻一多，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。他不满意于旧中国，不满意于黑暗势力，感觉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严重，可以说，是爱国志士，还不是革命者，是热情的诗人，并不是思想家。他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重大问题，认识是模糊或者是错误的。发表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《清华周刊》上的《恢复和平》（署名一多）一文，就对“波尔希维克的赤帜”表现出偏见。到一九二五年，这种偏见又有所发展。诗人前期思想上的短处，局限以至偏颇，在部分爱国诗中，或多或少或明或隐有所流露。

综观闻先生的诗，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缺乏分析和批判。这一点，我们只要将闻先生的诗和郭沫若的诗稍加比较，就一目了然。闻先生在《〈女神〉之地方色彩》中说：“我只觉得他喊着创造，破坏，反抗，奋斗的声音，比——‘倡导慈俭，不敢先底三宝’底声音大多了”。其实，这恰恰反映了闻先生思想上的弱点。《女神》的爱国主义很可宝贵的地方，最富时代精神的处所，正是在它将爱国主义同反抗精神、革命精神、创造精神结合在一起，同确信旧中国一定要毁坏，新中国必然出现的理想结合在一起。在这一问题上，闻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意见也

相左。鲁迅一九二五年写的一段话，颇能代表他前期的观点：

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，无论是古是今，是人鬼，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，祖传丸散，秘制膏丹，全都踏倒它。⑦

而闻先生在诗歌中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歌颂，其中就有不当之处。比如《我是中国人》说：

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盃，
盛着帝王祀天底芳醴——
我们敬天我们顺天，
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。

这显然是将中国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的生活美化了、理想化了，何况，“乐天安命”并不是值得提倡、肯定的东西。在《长城下哀歌》中，诗人正确地渲染了民族的危机，但同时又对打上了封建烙印的生活和文化，流露了深情：

啊！从今那有珠帘半卷的高楼，
镇日里睡鸭焚香，龙门泻酒，
自然歌稳了太平，舞清了宇宙？
从今那有石坛丹灶的道院，
一树的碧阴，满庭的红日，——
童子煎茶，烧着了枯藤一束？

不用解释，前一部分写的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，后一部分是遁世的所谓恬静境界，都不值得神往，也不能作为中国人民正常生活的象征。闻先生自己说信奉“文化的国家主义”，我看它在诗中的消极影响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往往笼统地加以赞美。闻先生的这种态度，不仅是不够科学，而且与当时的彻底反封建时代主潮，与革命先驱者的勇猛批判精神和步调，不很协调。

爱国自然要求救国，然而当时闻先生既不了解中国近代衰败的真正原因，又不知道救国的伟大力量和领导者何在，更不明救国的途径，不能科学地预见祖国的未来，所以在《长城下之哀歌》中写下了这样天真的包含着不正确认识的诗行：

神灵的祖宗啊！事到如今，
我当愿你们筑起这各种城寨，
把城内文化底种子关起了，
不许他们自由飘播到城外，
早些将礼义底花儿开遍四邻，
如今反教野蛮底荆棘侵犯进来。

似乎如果将中国的“礼义”之花传播出去，外国受到影响，就不会来侵略我国了。这里，一是夸大了文化的作用，二是天真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。诗里诗人的良好愿望和爱国情绪不可否定，但有些于事理不合，可能使读者失去兴趣。

闻先生的“文化的国家主义”思想，有时在诗中还表现为过分夸大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，如说“我们是东方底鼻祖”（《我是中国人》）。这未必准确，东方文化历史最悠久的，不仅有中国，还有印度。

所幸的是，闻先生思想感情中的消极面，只是在少数爱国诗中有所表露。收入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两个诗集中的爱国诗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这样，就并不有损于对闻一多诗的基本价值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其实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爱国主义，是政治思想的一部分，又属道德范畴，它还可以分为不同层次。在今天，既有一般的爱国者，又有人民的爱国主义，有马克思主义的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。爱国主义，还是一个历史范畴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。但是，所有的爱国主义者又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。热爱祖国神圣土地、河山，为保卫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反对侵略，反对卖国投降；反对分裂，主张统一，期望国富民强；尊重祖国的历史，敬仰历代有功于国家民族的杰出人物，珍贵祖国优秀文化等等，就是共同的内容。如果我们只强调不同点，忽视其不同点，就会影响我们对各层次的爱国主义者的正确认识和团结；要是我们只讲共同处，否认不同点，则会忽视将一般的爱

国主义者提高到共产主义水平。以二十年代的闻先生来说,不管他曾一度怎样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,实质上,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,他和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感情上是相通的。这就使得《一个观念》、《发现》、《祈祷》、《一句话》、《洗衣歌》、《孤雁》、《太阳吟》、《忆菊》、《七子之歌》、《爱国的心》等诗,具有不朽的价值,这也是他晚年思想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和动力。

至于为什么闻先生思想的消极面在许多作品里没有或很少留下痕迹,而在少数诗篇中则影响较大?这有多方面的原因。

文学历史告诉我们:一部文学作品,因题材、主题和别的限制,不便于作者全面地系统地表现他的思想观点,有的作品只能表现他的这一观点,有的只宜于表现他另一观点。如果是适宜于呈露作者正确认识的作品,结果就不曾留下作者思想消极面的影响,反之,结果也不同。

我们还应注意到,作为诗歌,不仅不同于哲学论文和政治论文,它不以系统地阐述作者的理论认识为主要任务,甚至也不同于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,它侧重于抒情。爱国诗,往往并不细致地说明爱国道理,主要是以爱国感情感人。在诗中,只要诗人的感情倾向正确,那么,感情的浓度、深度,刚柔

粗细的调配,亲切动人的合适程度,艺术的表现,就是最重要的了。例如闻先生的《爱国的心》,用五色旗作为祖国和自己爱国心的象征,这可能引起争议。我们知道,鲁迅先生因痛恨北洋军阀政府,遂恨北洋军阀政府沿用的五色旗。如果鲁迅先生来读这首诗,也许会提出异议。但闻先生也可以辩解说,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,我国的国旗就是五色旗,将它作为祖国的象征,不也可以吗?这些地方,不管是否留下诗人思想局限性的烙印,由于它的感情是爱国的,因此,不会对诗作本身的评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

总之,我们对闻先生的爱国诗,应给以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美学的评价,让他的那些优秀的爱国诗,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结晶,文艺的珍品,永久流传。

注释:

- ① 《闻一多全集·致闻家骅》。
- ② 《醒呀·附记》,载《现代评论》2卷29期。
- ③ 《七子之歌·题记》,载《现代评论》2卷30期。
- ④ 闻一多《评本学年〈周刊〉里的新诗》,载1921年6月出版的《清华周刊》第7次增刊。
- ⑤ 《闻一多全集(三)·致梁实秋》。
- ⑥ 《闻一多全集(三)·〈女神〉之地方色彩》。